

從復刊後的《觀察》看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命運

◎ 傅玄

《二十一世紀》雜誌2002年2月號刊載了王中江先生的論文〈從《觀察》看中國自由主義認同及其困境〉。王先生通過對《觀察》的考察，認為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失敗的原因，一是人為抵制，二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清高式的對政治冷淡及其半推半就，恰恰使「最壞者當政」。王文引發了筆者對《觀察》周刊及聚集在其周圍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思考。筆者覺得王文論述至1948年底《觀察》遭到國民黨政府查封時煞筆，乃言猶未盡，故擬就1949年復刊後的《觀察》繼續作一些討論。

勉強：「一邊倒」的真相

國共內戰進行到1948年，形勢已經明朗。國民黨大勢已去，愈來愈多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奔赴解放區，一邊倒向共產黨。中共發佈的「五·一」號召，可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邊倒」的標識。（也有學者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邊倒」稱作「革命化」）現在可以見到的有關著述中，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這一個根本性轉變的解釋，或者言辭模糊，或者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心態描述為真誠、欣慰，認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當然，關於這一點，似乎有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議案及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為證。然而，事實是否如此？也許透過復刊後的《觀察》，我們可以窺探到真相。

《觀察》的復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後。據《觀察》社的林元回憶，領導和聯繫《觀察》復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喬木、胡愈之、范長江、胡繩等人。胡喬木、胡繩等就復刊事請示周恩來。周的意見十分明確：「有那麼多的讀者，當然要復刊！」¹ 這樣《觀察》在1949年11月1日復刊了，並由周刊改為半月刊。

與原刊相比，封面上樸拙的「觀察」二字未變、首頁的撰稿人身份介紹未變，主要欄目還在，刊標也還在，只是刊標周圍的英文THE OBSERVER與INDEPENDENT NON PARTY卻沒有了。加花飾的首頁刊也還在，不過去掉了「儲安平主編」幾個字，雖然依舊由他主編。變化最大的是往日《觀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復刊後的14期（1949年11月-1950年5月）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費孝通、錢端升、王鐵崖、季羨林、笄移今、潘光旦等人，其中除費孝通多次出現外，其餘幾乎都只寫了一兩篇文章。以前從未在《觀察》上出現過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繩也出現了。

從整個刊物的文章內容看，與往日《觀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針除了歌頌新中國的內容，剩

下的就是對蘇聯、朝鮮、東歐國家的「觀察」和「報告」，還有就是有關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文章。令人吃驚的是，以往從未登載詩歌的《觀察》上，居然出現了郭沫若慶祝史達林七十壽辰的詩作〈我向你高呼萬歲〉。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出現在復刊後《觀察》的版面上，但文章已不同以往。經濟學家筮移今在〈人民幣的戰鬥任務〉這篇文章中，一反以往的風格，文中反復出現「反動派」、「階級性」、「戰鬥性」、「人民民主專政」等革命術語。看得出來，筮先生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來進行研究。但他對這種方法的生搬硬套，痕跡十分明顯²：

人類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只要有階級存在的地方，就是階級鬥爭的戰場……作為價值體現形式看的人民幣，作為商品計算單位看的人民幣，在人民政府運用下負有無比重要的戰鬥使命。

費孝通教授在復刊後的《觀察》發表的文章已和學術研究無關，大都是關於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如：〈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甚麼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後〉、〈從往上爬到大家互助〉、〈進步的包袱〉……作為原《觀察》最早和最經常的撰稿人，費教授顯然還在支援他的老友儲安平主持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不是過於疲軟？迎合的笑容是出於自願還是無奈？

舊日《觀察》的風格已經不再。《觀察》的發行量一落千丈，出版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後，奉命改為《新觀察》。

復刊前後的《觀察》差別如此之大，讓我們這些離它並不遠的後人也難以置信。而且前後主編竟是同一人！現在來看《觀察》復刊，這件事本身值得深思。首先儲安平及《觀察》同人有此願望。《觀察》復刊前夕，儲安平曾有信給林元，極為高興地告訴他：「經中央批准，《觀察》要復刊了！」此時的儲安平和其他留在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樣，對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充滿企望，對新中國滿懷熱情和美好的希冀。由此期待《觀察》重生並藉此實現以言論參政的理想。其次新誕生的政府有這個容納「異己」的雅量。但事後回想，人們又會為儲安平的選擇感到不可思議。

儲安平對國民黨沒有好感，這種感覺從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容易看出。他對共產黨有清晰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抽象的，因為他沒有直接和共產黨打過交道。1949年之際，多數像儲安平一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評價都是僅止於一般認識，因此，若說他們此時從內心深處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不足為信的。但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選擇了共產黨，而不是逃奔海外或隨國民黨潰退台灣。以儲安平的個人經歷而言，他不容於國民黨在當時是不宣之秘；至於共產黨，內戰以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深得人心，贏得了包括儲安平這類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內的普遍好感。個人的直接遭遇和這種好感，使儲安平這樣堅定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自己人生道路中陷入了不可避免的選擇。

對於《觀察》復刊，儲安平本來抱以喜悅的心情並寄予希望。但是復刊後的《觀察》已非彼《觀察》。我們無從知道《觀察》復刊期間儲安平的思想變化，唯一能反映他這一時期的思想的，是他為《觀察》復刊寫的〈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從這篇文章的文字、敘事方式上看，令人懷疑是否出自儲安平之手。但是這篇文章又符合他的風格。細讀這個過去的文本，我們會發現，作者在敘述事件經過時，使用的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評價當時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過去時，則完全使用的是源自當時流行的報刊語言。例如，文中諸如「蔣介石這個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種種用語，在儲安平以前

的文章裏從未有過。整篇文章給人的印象是：抽象、空洞、雷同。與儲安平往日犀利的言辭、客觀超然的態度截然不同。文章毫無感情地否定了《觀察》在過去的成績，不加懷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

但下面的一段話，給人的感覺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筆，還出自他的內心³：

我們的內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們有理想，但這個理想是抽象的、籠統的、沒有具體內容的；我們有熱情，但這股熱情是虛浮的、飄蕩的、沒有一定寄託的。

……因為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並沒有靠攏共產黨。……

這段話可謂對當時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心態的真實寫照。隨著國民黨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總體大崩潰，眾多自由主義者已經十分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共產黨必定勝利。而他們曾經渴望在一個多黨聯合甚或由他們自己主持的政府之下，能夠出現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實際上是無望了。換言之，他們已經敏感到自由主義運動的失敗。但他們無力挽回。形勢迫使他們除了像胡適一樣遠遁國外，就必須在國共之間做出選擇，不是一邊倒向國民黨，就是一邊倒向共產黨。結果，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邊倒」向中共，儘管「因為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他們的心「並沒有靠攏共產黨」。在這個「一邊倒」過程中，他們的「內心是空洞的、彷徨的」。一方面，他們「有理想」、「有熱情」；另一方面，他們又因為「這個理想是抽象的、籠統的、沒有具體內容的」、「這股熱情是虛浮的、飄蕩的、沒有一定寄託的」而困惑、痛苦。更主要的，是他們「不瞭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對自己即將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命運感到彷徨，甚至恐懼。

總體說來，1948年後，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邊倒」向共產黨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具體說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一邊倒」過程中的真實心態，從復刊後的《觀察》和以往聚集在《觀察》周圍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顯著的變化，可見他們對於「一邊倒」的心理是困惑、彷徨、恐懼（當然也夾有一些對未來的憧憬），一言以蔽之，是勉強的，而非欣慰、自願的。

喪魂：擴大化的思想改造的後果

中國自由主義到了40年代末，已經在理論上陷於空前的混亂。一方面，有像儲安平這樣的正統自由主義者仍然堅持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已開始拋棄這種對自由主義的傳統看法，而接近一種更為激進的自由主義。當時自由主義的重要刊物上海《大公報》就宣稱：「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成民主社會主義。」⁴ 蕭公權則提出「自由社會主義」的概念。所謂「自由社會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採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長」的「一個集成合美」⁵。實際上，究其本質，也就是對當時第三條道路或中間路線的另一種理論概說。儘管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如何具體界定和走上中間路線的問題上意見不一，但他們都對它抱有較大的希望，認為中國除走上這條道路外別無出路。事實上，他們的呼聲除了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未來前途及政治走向的憂慮和關注之外，並沒有提供比這更多的東西。內戰的炮火使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對中國未來政治的設計與夢想，始終限於紙上。沈重的失敗感使他們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未來的命運失去了信心。中間路線的破產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理論混亂和對自身命運的悲觀看法，使他們意識到他們自己也許終究無法成為中國現實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施復亮承認說：「在中國的具體

條件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但他又勉勵同道者：「自由主義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氣概，只須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穫一定屬自己……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⁶ 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發展至此，它的銳氣和信心已被現實磨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一邊倒」向中共並幾乎沒有反抗地接受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是十分自然的。

毫無疑問，建國伊始，為了盡快醫治戰爭的創傷、順利完成新中國各項建設任務，對「舊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這也符合共產黨重視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教育的一貫主張。問題在於，從一開始起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就露出了擴大化的趨勢，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思想改造的對象從「舊知識份子」向各行業滲透，二是思想改造的範圍從單純的個人思想問題擴展至人生觀、世界觀乃至靈魂深處。最早受到強調的是對「舊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當時知識份子中流行著「厭惡政治」和「超越政治」的思想，費孝通對此頗為警惕，他在1949年11月16日發表於《觀察》的文章〈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中，分析了知識份子「厭惡政治」和「超越政治」的思想根源，認為「他們還沒有認清時代，認清自己」，所以知識份子要進行「政治學習」⁷。不久後發表的盧於道的文章〈政治熱情與科學熱情〉提出，自然科學工作者要把「政治熱情」與「科學熱情」相結合⁸。而王亞南的文章〈論革命與科學的統一〉則進一步提出「只有進步階級的強烈階級意識能發揚科學真理」，以此證明一切科學工作者都必須進行思想改造⁹。這種認識到後來竟發展為「每個從舊社會裏來的人皆得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¹⁰。

如果僅從字面來看，「思想改造」是一個和單純的個人思想問題有關的辭彙。但是一旦將其置於意識形態過分強化的語境之下，它也就成為「換腦筋」、「搞通思想」的非通俗說法。從復刊後的《觀察》刊登的文章來看，對知識份子實行思想改造的最初措施，也就是規定各大學把《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列為全校學生必修課程，以便「確立馬列主義黨底世界觀」¹¹。在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對已經執政的共產黨及其理論缺乏瞭解甚至根本不瞭解的情況下，作出如此規定是明智的、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一項高校教育任務，很快在知識界發展為一個「學習政治」的熱潮。進而有人提出光學習政治還不夠，還必須進行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於是，「在各種報紙雜誌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舊知識份子在自我改造過程中所作的種種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有許多原來已經在『知識界』中居有一定地位的所謂高級知識份子，也在發表他們自我改造的經驗。」¹²從這一點出發，有人總結說，對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工作，「理論改造容易，行動改造困難」，強調思想改造要理論聯繫實際，「特別是和自己行動的聯繫，而要在自己的行動上有具體的體現」¹³。至此，思想改造的範圍已是一個從內心世界到外在行動的全面的「脫胎換骨」過程了。

如果我們將以上兩個具體的思想改造擴大化的趨勢與50年代末的反右鬥爭擴大化甚或文革期間的「無限上綱」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將會發現它們有著驚人的相似。前者是後者的一個預兆，還是一個隱患？如此問題，是值得後人深思的。

由此我們再回到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命運的討論時，便不難發現其命運的悲劇色彩。不論從國民黨統治下走向新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思想改造是怎樣一種心態，事實表明他們接受了思想改造，從而「脫胎換骨」成為與一般工農群眾無異的普通人民。他們無條件

地支援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他們不再堅持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場，失去了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的適度的張力，他們喪失了自由主義的靈魂。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念，強調的是個體的價值與個體的自由，但是在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最初作為一種國家的富強之道由西方引進，此目的一直受到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者的重視。特別在五卅及五卅以後，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一項十分重要而又艱難的工作，就是如何通過和平的手段促使當權者進行政治與社會的改革，這就決定了他們必然與政治發生聯繫。但是他們既不能同當權者進行種種耐心的周旋，也不能同大眾建立密切的聯繫，而他們之間又難以形成強大的聯合，這就使他們具有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與政治不可分割卻又注定只能處在政治的邊緣，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矛盾，也是其悲哀。也許恰是他們對政治的功利性追求使他們失去了在政治上的發言權，因而自由主義終究歸於沈寂。

註釋

- 1 林元：《碎布集》（北京：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頁404。
- 2 2 笄移今：〈人民幣的戰鬥任務〉，《觀察》，6卷4期。
- 3 儲安平：〈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觀察》，6卷1期。
- 4 鍾離蒙、楊鳳麟：《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彙編》，第四集第二冊（沈陽：遼寧大學哲學系，1982），頁93。
- 5 蕭公權：〈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跡園文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289-90。
- 6 蔡尚思、李興華：《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篇》（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323。
- 7； 11 費孝通：〈知識份子與政治學習〉，《觀察》，6卷2期。
- 8 盧於道：〈政治熱情與科學熱情〉，《觀察》，6卷4期。
- 9 王亞南：〈論革命與科學的統一〉，《觀察》，6卷5期。
- 10 謝逢我：〈我的思想總結〉，《觀察》，6卷8期。
- 12； 13 焦孟甫：〈論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觀察》，6卷6期。